

杨继洲学术思想来源探究

刘珊¹, 段晓华², 唐禄俊², 张其成^{2*}

(1.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48 号, 310053;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摘要 杨继洲为明代著名针灸学家, 有著作《针灸大成》流传于世。《针灸大成》乃明以前中医针灸之集大成者, 对后世影响甚深。该书收录诸多著名针灸著作之内容, 同时还有杨继洲针刺手法、医案、考卷等, 形成了具有杨继洲学术思想特色的“杨继洲针灸”。杨继洲学术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家族医学背景以及其学医经历和行医实践影响, 同时还受易学、儒家思想及道教思想影响。

关键词 杨继洲; 针灸大成; 易学; 儒家思想

杨继洲, 名济时, 字继洲, 以字行。从杨继洲医案与其从事医官活动的年代推测, 其生活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杨继洲所处的明代是中医学全面丰收的黄金时期^[1], 在元代学术争鸣的基础上, 明代医家通过临床实践加以融会贯通, 形成了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2], 明代的社会思潮诸如理学、心学、实学对医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3]。杨继洲生活的明代后期, 国家由富强转向衰弱, 民怨沸腾, 农民起义频发, 疫病流行, 引起医学界高度重视, 同时也促进了明代医药学迅速发展, 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医药学家。杨继洲出身于医学世家, 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基础, 在进入太医院供职之时已是声名卓著, 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 广求群书, 采录《素问》《难经》《神应经》《古今医统》《医学入门》等 32 部明以前关于针灸的著述, 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针灸大成》一书^[4], 全面总结了明以前的针灸学成就, 至今仍是针灸学界流传广、影响大的著作之一。该书的问世是继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之后又一部针灸巨著, 是我国针灸学的又一次重要总结^[5]。

《针灸大成》收录了明代以前诸多著名针灸著作之内容, 同时又有杨继洲之注解、针刺手法、医案、考卷等, 形成具有杨继洲学术思想特色的“杨继洲针灸”。杨继洲学术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家族医学背景以及自己的学医经历和行医实践影响。

同时还受易学、儒家思想及道教思想等影响。

1 主观因素

1.1 家族医学背景

杨继洲学术思想的形成首先受家庭医学背景影响。杨继洲出身于医学世家, 他的祖父杨益曾任太医院太医, 授有《医学真秘》, “尝纂修《集验医方》进呈, 上命镌行天下”^[6]。其父名杨闇, 嘉靖间太医院吏目。家中藏有大量医书、秘方等医学资料, 有家传医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杨继洲幼年便是在这种浓厚的医学氛围的熏陶下长大的, 他幼年学儒, 但因科场不顺, 最终未能走上科举路, 弃儒从医。“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是这一时期儒士的心理归依, 由此而从医的医家大有人在, 如万全、汪机、张介宾等, 杨继洲亦是其中之一。科举失败后, 杨继洲以对医学浓厚的兴趣自学家中所藏医学秘籍, 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 编撰完成《针灸大成》一书, 该书的广泛流传使得“杨继洲针灸”传承至今。

1.2 学医经历及行医实践

在习医过程中, 杨继洲重视对中医经典的刻苦研读, 如在《针灸大成》卷一“针道源流”中, 他援引了《素问》《难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经典中的内容, 进行创新并加入自我认识, 颇有自己的心得与见解。他在习医过程与临床实践中总结前人经验, 在新的理论指导下, 提出新的针灸操作手法, 致力于对中医针灸的刻苦钻研与不断实践, 成就了精湛的医术。《针灸大成》第九卷“医案”部分记载的医案体现出杨继洲高超的医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6ZDA234)

* 通讯作者: zhangqicheng96@163.com

如“辛酉，夏中贵患瘫痪，不能动履，有医何鹤松，久治未愈。召予视，曰：此疾一针可愈。鹤松惭去。予遂针环跳穴，果即能履”^[962]。此类医案不在少数，在此不逐一列出。杨继洲精通中医理论、临床各科，施治灵活，能发挥各法的优点，且根据丰富的临床实践，尊古而不泥古，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识。其处方用穴也有“精取穴、两组处方、多处方、多病症、几种配穴法”等特色，可以看出，杨继洲不仅善于理论研究，而且对临床也很有成就^[9]。

杨继洲行医始自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明隆庆二年（1568 年）进太医院供职，历任楚王府良医、太医院御医等职。《针灸大成》一书刊成之际，杨继洲已七十有九。从《针灸大成》卷九“医案”部分的三十一则医案可见其行医足迹遍布中国多个地区，如平阳、汶上、磁州、扬州、建宁等地。在一生行医过程中，杨继洲交友甚广，这增加了他为多种职业、多种层次患者治病的机会，累积了更多经验。且这些人中不乏学医之人，这也从另一角度丰富了他的医学知识。社会名流或王公大臣还为其做序跋，推动《针灸大成》的传世。

2 客观因素

《针灸大成》中也有很多杨继洲个人见解，包括注解、针法、医案等内容。在《针灸大成》中反映其学术思想的内容可分为两方面：1) 杨继洲引用、收录的内容从侧面反映出其思想，或者说反映出他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2) 杨继洲注解、针法、医案等个人创新内容，可直接体现杨继洲的学术思想。这些内容主要包括《针灸大成》卷一对援引诸书情况的简要评述，卷三“策”为考卷，卷四针刺手法部分“三衢杨氏补泻”“经络迎随设为问答”，卷九“医案”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杨继洲的学术思想。以下主要讨论他受易学、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之影响。

2.1 受易学之影响

《针灸大成》多处都体现了杨继洲受易学之影响，如在卷三“诸家得失策”中，杨继洲直接引用《易经》原文内容，曰“愚尝观之《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象》对《易经》第一卦“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中的“元”进行的解释，而“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象》对《易经》“坤卦”的卦辞进行的解释。其引用该

句来解释天地之间的“一元之气”循环不止，产生了阴阳、五行、四时等，万物由此而化生，人体也是天地化生万物中的一部分。在卷九“医案”中，记载明隆庆二年（1568 年）吏部观政李遂麓公患痞块之疾，杨继洲将其治愈。在遂麓公问杨继洲“痞”与“痃癖”“积聚”“癥瘕”区别时，杨继洲引用《易经》之内容，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谓天地不交之否，内柔外刚，万物不通之义也。物不可以终否，故痞久则成胀满，而莫能疗焉”^[963]。他认为，“痞”就像否卦一样，是“不交”“不通”所致，“物不可终否”，因此，若患“痞”症，不可令其久，需尽早治疗，否则“痞久则成胀满，而莫能疗焉”。

除直接引用《易经》原文内容，杨继洲的针刺法也能从一定程度反映出其受易学之影响，将易理运用于针灸临床实践中。比如根据补泻的不同，区分针刺时的左旋、右旋，行针时区分“九阳数”与“六阴数”，可见他非常重视“数”的概念。关于“数”，杨继洲在“穴有奇正策”和“针有深浅策”中有解释，曰“然针固合法义，而数必取于九者，何也？盖天地之数，阳主生，阴主杀，而九为老阳之数，则期以生人，而不至于杀人者，固圣人取数之意也”^[968]。“九”是老阳数，给人以生的象征，相反“六”为老阴数，阳主生而阴主杀。在补法中行“九阳数”取“九”主生之意，泻法中行“六阴数”取“六”主杀之意。在“针有深浅策”中，杨继洲在回答针刺法治先寒后热和先热后寒之病时，认为“先寒后热，须施以阳中隐阴之法，先行九阳数再行六阴数。先热后寒者，用以阴中隐阳之法，先行六阴数再行九阳数”^[969]。此外，《针灸大成》中还有九宫图、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内容。总之，这些均说明杨继洲在习医过程中对《易经》也有一定的研究，并将易学思想用于其针灸理论与实践。明代医易学发展达到极盛阶段^[9]，《针灸大成》中体现的易学思想也从一定程度反映杨继洲受明代易学之影响。

2.2 受儒家之影响

杨继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就体现在他的医德上。他自幼习儒，虽最终未走上科举之路，但早年的学习经历难免会影响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传统医德与儒家思想关系最为密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传统医德的主要观念是“医乃仁术”^[10]，核心为“精”“诚”^[11-12]。《针灸大成》卷九的“医案”中记载

对待患者的态度可体现出他的医德。如“壬申岁，大尹夏梅源公，行取至蛾眉庵寓，患伤寒。同寅诸公，迎视六脉微细，阳症得阴脉，……予居玉河坊，正值考绩，不暇往返之劳，若辞而不治，此公在远方客邸且莅政清苦，予甚恻之……”^[970-971]。隆庆六年（1572 年），大尹夏梅源寓蛾眉庵，患伤寒六脉微细，杨继洲居玉河坊且正值考绩，但因同情夏在远方客邸，且莅政清苦，因之不辞往返之劳，竭精殚思为之治疗而愈。还有“甲戌岁，观政田春野公乃翁，患脾胃之疾，养病天坛，至敝宅数里，春野公每请必亲至，竭力尽孝。予感其诚，不憚其远，出朝必趋视”^[972]。万历二年（1574 年），田春野乃翁患脾之疾，养病天坛，至杨宅数里，田春野每请必亲至，竭力尽孝，杨继洲感其诚，不憚其远出朝必趋视。杨继洲所医病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常百姓，即《大医精诚》所谓：“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12]。在与同僚相处时，他从不贬低同道，凡是遇到奇证痼疾，常与同僚徐东皋、何鹤松相推荐，因此，其医德与医术均受人称赞。

2.3 受道教之影响

杨继洲所处的明代道教兴盛，多位皇帝由于对长生不死、禳灾祛病和祈求神示等多方面的需要，使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信仰道教，推崇道教^[13]，在医学领域，很多道家、神仙方术也得以盛行。在此背景下，医学理论和实践中保留祝由术，类似于现在的“精神安慰”或“心理疗法”。在《针灸大成》医案中如实记载了类似病例，如明万历三年（1575 年），李户侯夫人患怪症，杨继洲用孙真人十三针治愈，原文为“乙亥岁，通州李户侯夫人，患怪症，予用孙真人治邪十三针之法，问病者是何邪为害？对曰：乃某日至某处，鸡精之为害也。令其速去。病者对曰：吾疾愈矣。怪邪已去，言语遂正，精神复旧，以见十三针之有验也”^[973]。其中“鸡精之为害”是杨继洲诊断其致病病因，以“孙真人治邪十三针之法”治疗，对此我们应该辩证认识。“孙真人治邪十三针之法”即“孙真人针十三鬼穴歌”，《针灸大成》卷九中有收录，此歌赋前一节原收录符咒，这具有明显的道教色彩，由张缙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针灸大成校释》一书中已将其删去。另外，在《针灸大成》卷三收录的针灸歌赋中，有“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马丹阳即马钰，为道教北

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精通针灸，此歌是据其多年临床经验编写，疗效可靠，在针灸史上有重要地位。此类内容虽不多，但从杨继洲将其收录于《针灸大成》一书中的做法看，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杨继洲受道教的影响。

3 结语

从历史上看，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及他们获取的成就均受当时社会思潮、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杨继洲亦不例外。他早年弃儒从医，在家庭医学氛围的影响下刻苦研读家中所藏医学书籍，这是他的医学启蒙。杨继洲在学医过程中孜孜不倦，不断进行理论钻研和临床实践，促成了《针灸大成》一书的问世。“杨继洲针灸”以《针灸大成》为载体传承至今，为中医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谭国俊. 明代医学发展的社会因素 [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4, 14(3): 8-10.
- [2] 高燕. 明代中医外科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外科学的比较研究 [J].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7: 26.
- [3] 袁卫玲. 明代社会因素对妇产科学的影响 [J]. 福建中医学院, 2005: 1.
- [4] 黄雪呈. 明代医家针刺补泻手法研究 [J].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0: 12.
- [5] 朱建平. 中国医学史研究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3: 52.
- [6] 杨继洲. 针灸大成 [M]. 刘从明,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8: 3.
- [7] 张缙. 针灸大成校释 [M]. 2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 [8] 斋藤宗则. 杨继洲学术思想研究概况 [J]. 中医文献杂志, 1997, 15(1): 40-43.
- [9] 徐仪明. 试析明代医易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 [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03, 39(3): 1-9.
- [10] 潘新丽. 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德的影响 [J]. 社会科学家, 2011, 172(8): 11-14.
- [11] 吴隽. 论以“精”“诚”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医德 [J]. 文史杂志, 2018(1): 21-24.
- [12]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魏后亮, 郭瑞华,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 8.
- [13] 向世陵. 明代的宗教与三教合一 [J].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1999(4): 24-29.

(收稿日期: 2019-01-11; 修回日期: 2019-02-15)

编辑: 黄 健